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德] 雷马克 著
朱雯 译

西线
无战事

Erich
Maria
Remarque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德] 雷马克 著
朱雯 译

西线无战事

Erich
Maria
Remarque



文
景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Horizon

西线无战事

[德] 雷马克 著

朱雯 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郝蕴馨

封扉设计：周伟伟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6.25 字数：151,000 插页：2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ISBN: 978-7-208-12815-6 / I·134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线无战事 / (德) 雷马克著; 朱雯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815-6

I. ①西… II. ①雷…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5044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这本书既不是一种控诉，
也不是一份自白。
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
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
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

我们待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昨天我们才换了防，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牛肉和菜豆。我们感到一种平和中的满足。每个人甚至还有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留到晚上吃。另外，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这样可以让我们好好地休整一下。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这种好事了。那个脑瓜像番茄一样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他用长柄勺子招呼每一个走过的人，舀给他结结实实一大勺菜肴。他不知道该怎么把他的炖锅及时清空好用来盛咖啡。加登和缪勒端着两个脸盆，里面的食物满得都快要溢出来了。这些是他们的储备，加登这么做是出于贪食成性，而缪勒这么做则是出于深谋远虑。至于加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那倒是一个谜，因为他现在和今后一直像一匹瘦骨嶙峋的马。

更重要的是，烟也发了双份。每个人十支雪茄，二十根纸烟，还有两块嚼烟。在眼下，这已经很可观了。我拿嚼烟去换卡钦斯基的纸烟，这样我就一共有四十根纸烟，抽一天是足够了。

说真的，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些意外的收获。普鲁士人并不那么慷慨大方。多亏计算错误，我们才捞到了这么多东西。

十四天前，我们不得不开到前线去调防。那一带的战事相当平静，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征用了正常数量的每日给养，供全连

一百五十人回来时享用。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数量惊人的英国重炮向我们袭击，对准我们的阵地不停猛轰，因此我们的损失十分惨重，只有八十几个人活着回来。

昨天夜里，我们撤离前线安顿下来后，立刻好好地睡了一觉。卡钦斯基说得很对，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这个战争也不算太坏。在前线，我们几乎不曾睡过什么觉，一连熬了十四天，时间是够长的了。

第一批人还没爬出营房，已经是正午了。半小时后，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跑到随军伙房前排队，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飘了过来。排在长队最前头的自然是最饿的那些人：小艾伯特·克罗普，我们中间头脑最清楚的思想家，所以只当了个一等兵；缪勒，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梦想着考试，在炮火密集轰击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物理定理；勒尔，他蓄着络腮胡子，特别喜爱军妓院里的姑娘，他一口咬定，按照军队里的命令，这些姑娘都得穿上丝绸衬衫，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事先还得洗个澡；第四个便是我本人，保罗·博伊默尔。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四个人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

紧跟在后面的的是我们的朋友：加登，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年纪与我们相仿，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坐下来吃的时候，他瘦得像只蚂蚱，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海伊·韦斯特许斯，也跟大家同年，是个挖泥煤的，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条配给面包抓在手里，问人家：猜猜看我手里抓的是什么东西；德特林，一个农民，他除了农家院和妻子，什么也不想；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卡钦斯基，我们这伙人的头儿，坚强，机灵，狡猾，他年纪四十，有一张土灰色的脸，一双蓝幽幽的眼睛，一副佝偻的肩膀，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它嗅得出糟糕的天气、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在炊事房前面，我们这伙人站在长队的最前面。我们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因为那炊事员一直没理会我们。终于，卡钦斯基朝他喊道：“我说，赶快把你的舀汤勺

子拿出来吧，海因里希！大家都看到菜豆已经煮熟了。”

炊事员睡眼惺忪地摇了摇头：“你们先得都到齐了才行。”

加登龇牙咧嘴地笑了笑：“我们都到齐了。”

那炊事班下士依然不理睬：“你们几个都到齐了！可是其他人到底在哪儿呢？”

“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他们不是在野战医院，就是群葬在地下长眠啦。”

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后，茫然不知所措。他动摇了。“可我已经煮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

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一下。“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来了，开饭吧！”

加登心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那老鼠似的尖脸蛋兴奋起来，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下颚抽动着，他往前走了一步，小声说道：“伙计，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够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是吗？”

那炊事班下士愣头愣脑、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

加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那香肠呢？”

那个番茄脑瓜又点了点头。

加登的皮套裤在颤动。“纸烟也是一样的吗？”

“是的，样样都一样。”

加登容光焕发了。“哎呀，这才叫做走运咧！全是给咱们准备的！每个人都能得到——让我算一算——一点不错，正好是双份！”

番茄脑瓜这才回过神来，说：“那可不行。”

我们都很兴奋，开始围拢过去。

“那为什么不行，你这个老胡萝卜头？”卡钦斯基质问道。

“本来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

“我们这就让你看看八十个人怎么把这些东西解决掉。”缪勒喃喃地抱怨着。

“饭菜我可一点不在乎，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番茄脑袋坚持道。

卡钦斯基生气了。“你这一次就不能宽宏大量些？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你领的是二连的，这就够啦。那你发给我们吧！我们正是二连嘛。”

我们动手推撞那个家伙。对这个人谁都没有好感，有过好多次，由于他的过错，饭菜送到战壕里太晚，而且都凉了。因为在炮火底下，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不得不比别的连队多跑一段路。现在，一连连的布尔克要好得多。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仓鼠，可是临到紧急关头，他甚至会把手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

我们心里都憋着这股火，若不是连长到来，肯定会发生一场骚乱。他问清了争吵的原因，只说了一句：“是的，我们昨天损失惨重。”

随后，他朝那锅子瞥了一眼。“这些菜豆看样子还不错。”

番茄脑瓜点点头。“是用猪油和肉一起煮的。”

那中尉瞅着我们。他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是一个下士，后来是从行伍中间被提拔上去的。他又把大铁锅的盖子揭开，嗅了一下。于是他一边往前走，一边说道：“给我送一满盘来。把所有的饭菜都分发掉。我们也许用得上。”

加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番茄脑瓜的脸上露出一副局促不安的神情。

“这又不会破费你什么！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一人似的。现在你就动手分吧，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可你千万别数错了。”

“你真该被绞死！”番茄脑瓜咒骂道。他已经垮掉了，每当事情超出他的掌控时，他就干脆认输。似乎为了要表示对此感觉无所谓，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蜂蜜。

今天真是了不起。邮件也送来了，差不多每个人都有几封信和报纸。我们溜达到营房后面的草地上。克罗普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

草地右边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盖了屋顶，结构也很坚固。不过这是给新入伍的士兵用的，他们还没有学会怎么样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我们却需要更好用的。到处散落着一只只矮小的箱子，就是为了那个用途。这些箱子是方形的，很干净，四边都用木板围着，座位舒适得无懈可击。边上还有把手，可以随意搬动。

我们搬来了三只，围成一个圆圈，大家舒舒服服地坐下。这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才站起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非得用公共厕所不可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感到不好意思。厕所没有门，二十个人并排坐着，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这样，一眼就可以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时刻有人监视。

这期间，我们学会了对这类小节不再觉得害臊。到后来，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不当回事了。

这里虽然是露天，上厕所却全然是一种享受。我再也无法理解，我们从前对这类事情为什么一定要觉得害臊，其实还不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这类事情若不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若不是在我们的心目中偏偏又显得那么新奇，我们也许不会对它们特别注意。对老手来说，它们早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胃肠这些器官对士兵说来比对别人可要亲密得多。他四分之三的词汇都是从这里得来的，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而且在表达最深的愤怒时，都能在此处信手拈来。要表达得这样贴切，这样清楚，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回到家里去，家里人 and 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可是在此地，这却是一种通用语言。

这种强制性的公开，已经使这些事情在我们心目中恢复了它们那纯

洁的性质。更何况，它们本来都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事，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正像玩纸牌时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一样畅快。胡诌出“粪坑传闻”这个词，倒不是毫无道理，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市集和公共休息室咧。

我们觉得此时此刻好过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在那里，只能说是卫生，可在这里，却是美妙。

眼下真是个出奇无忧无虑的时刻。头顶上是一片蓝天。天边悬挂着浅黄色的照亮的侦察气球，被阳光照得灿烂异常，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一团团白茫茫的烟雾。发射时，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升了上去。

我们隐约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好像十分遥远的雷鸣。野蜂嗡嗡地飞过，就把这种声音压了下去。

在我们周围，伸展着一片繁花盛放的草地。青草摇摆着高高的嫩枝，白蝴蝶翩翩翻飞，飘浮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我们读着信，看着报，一边还抽着烟。我们摘下了军帽，放在身边。和风拨弄着我们的头发，也在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

三口箱子就放在那光闪闪、红艳艳的野罌粟花中间。

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膝盖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合适的玩纸牌的桌子。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每打完一回一人公开亮牌的牌局，就插进一局拿破仑牌戏。人们可以永远这样坐下去。

手风琴的乐声从宿营地那边飘过来。我们不时搁下纸牌，向四周张望。一个人会说“孩子们啊……”或者说“那一回可真是九死一生咧……”，于是我们便沉默半晌。心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压抑之感，大家都能意识到，不需要用多少言语来表达。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眼下，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因此，样样东西都是新鲜的，强烈的——般红的罌粟、可口的食物、纸烟，还有夏天的风。

克罗普问：“最近有谁看见过克默里希？”

“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我说。

缪勒认为他的大腿被一颗子弹打穿了，可以幸运地回家养伤了。

我们决定当天下午去探望他。

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坎托列克要我向你们大家问好。”

我们都笑了。缪勒把纸烟扔了，说道：“我倒希望他也在这里。”

坎托列克原来是我们的老师，一个严厉的矮子，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长得活像一只尖嘴老鼠。他的身材，跟有“克洛斯特堡的恐怖”之称的希默尔施托斯下士差不多。说也奇怪，天下的不幸往往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他们精力更加旺盛，更加不容易相处。我一向十分留神，绝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纪律的忠实拥护者。

在体能训练课上，坎托列克向我们做了长篇报告，直到全班的人，在他的带领之下，一起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他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用令人感动的嗓音说道：“你不愿意参军吗，同志？”这一切仍然历历在目。

这些教师往往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备用，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炫耀炫耀。可是在那时，这一点我们却并没有想到。

我们中间，确实有一个人迟迟疑疑，不愿意入伍。那个人就是约瑟夫·贝姆，一个胖胖的、和气的小伙子。可是他还是被说服了，否则他会被周围人疏远的。而且和他一样想法的，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不过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因为在那个时候，连自己的父母也随时会说出“懦夫”这个词。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参战都一无所知。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贫穷和单纯的人，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而那些处境较好的人，本该对战争会产生什么后果看得更加清楚一点，却反而快乐得忘乎所以了。

卡钦斯基断言，这都是由于他们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这些话，

都是他经过仔细考虑的。

说也奇怪，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在一次冲锋时，他的眼睛受了伤，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让他等死。没法将他带回来，因为我们自己也是手忙脚乱地逃回来的。那天下午，我们忽然听到他在呼唤，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真空地带”爬了过去。原来他仅仅是昏了过去，因为他双目失明，而且又疼得发疯，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回来，他就被打死了。

我们自然不能怪罪坎托列克。如果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那么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用的也是无损于自己的方法。

而这也正是他们让我们感到无比失望的原因。

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而言，他们理应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走向工作、职责、文化和进步的世界，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向导。我们常常嘲笑他们，稍稍作弄他们一下，但是在内心深处却是信任他们的。他们代表的权威的观念，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更合乎人性的智慧联系在一起的。可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死者，却把这种信念完全击碎了。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他们只是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了我们。那第一次密集的炮火就向我们揭示出了我们的错误，而他们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崩溃了。

他们仍在继续写文章，发表演说，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他们依旧在说对国家的责任是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已经知道死亡的剧痛比以前更为强烈了。尽管这样，我们绝不作叛乱者，绝不作逃兵，也绝不作懦夫——这些词，他们原是随便使用的——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我们英勇地参加每一次进攻，但我们还会辨别是非，我们一下子学会了观察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荡然无存。我们突然觉得孤独得可怕，而又必须一直孤独下去。

在动身去看克默里希之前，我们先收拾好了他的东西。这些东西，他在回去的路上都要用的。

野战医院里活动非常繁忙：里面始终弥漫着一股石炭酸、脓液和汗水的气味。这种气味，我们在营房里大多是闻惯了的，可是到这里一闻，却还是感到很不舒服。我们打听克默里希在哪里，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看到我们时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其中既有喜悦又有一种无助的愤怒。在他不省人事的时候，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

缪勒摇了摇头：“我总是跟你说，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

缪勒这个人有点粗鲁，也不太圆滑，要不他就不会吭声了，因为每个人都看得出来，克默里希是再也不会走出这个病房了。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已经完全没有不同，至多也只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

“情况怎么样，弗兰茨？”克罗普问。

克默里希把脑袋沉了下去。“还不坏，只是我的脚可他妈的疼得太厉害了。”

我们看看他的被子。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被子呈拱形盖在上面。我往缪勒的胫骨上踢了一下，因为他差一点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人员告诉我们的话讲给克默里希听：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他的腿已经被截去了。

他的气色很可怕，萎黄又苍白，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纹路，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因为到如今已经看见过几百次了。那其实不是纹路，而是标志。在皮肤下面，生命已经不再搏动，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去了，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而且早已把一双眼睛给控制住了。这里躺着我们的伙伴克默里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蜷缩在弹坑里；这仍然是他，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他的形象变得模模糊糊，仿佛一张冲洗了两次照相底片。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沙哑无声了。

我想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他母亲，一个胖乎乎的善良女人，陪他到了车站。她不断地流着眼泪，把脸蛋儿哭得又胀又肿。克默里希为此觉得不好意思，因为她无法沉着镇定，简直瘫成一团，成了个泪人。后来她看见了我，一再拉住我的手臂，恳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他确实有着一张儿童似的脸，而且骨头也是那么软弱，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可是在战场上，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

“现在你马上可以回家了，”克罗普说，“如果是等休假，你至少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

克默里希点点头。我不忍看他的手，那双手简直像蜡一样。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颜色蓝里透黑，如同毒药一般。我忽然转了一个念头，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还会继续生长，仿佛地窖里精灵鬼怪般的瘦细植物。我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它们像开瓶器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一个劲地往上长啊长啊，而同时往上长的还有那腐烂了的脑壳上的头发，好像沃土里的青草，的确像是青草，这怎么可能呢？

缪勒弯下身去。“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弗兰茨。”

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把它们搁在床底下。”

缪勒照他的话做了。克默里希又提起那块表来了。我们怎么才能叫他放心又不引起他疑心呢！

缪勒直起腰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筒靴。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货，用柔软的黄色皮革制成，高到膝盖，从下往上都有带子系缚着，是件叫人艳羡的东西。缪勒一看就很高兴，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比了一比，问道：“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起带回去吗，弗兰茨？”

我们三个人都有同样的想法：即使他恢复了健康，也只能穿一只皮靴，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总是没有用处的了。可是，照眼下的情况看来，把

它们留在这里很可惜——等他一死，护理员自然马上就会将它们拿走的。

缪勒重新拿起来：“你是不是愿意把这双靴子留在这里？”

克默里希表示不愿意。这是他最好的一件东西。

“那我们不妨拿东西来交换，”缪勒又建议道，“在前线这里，人们倒是用得着它。”可是克默里希却没有被说动。

我往缪勒的脚上踩了一下，他才勉强把这双漂亮皮靴放回床底下去。

我们又谈了一会儿，随后就告辞了。“好好保重，弗兰茨。”

我答应他明天早晨再来。缪勒也这样说，他是在想着那双系带皮靴，所以要亲自在场监视。

克默里希呻吟着。他在发烧。我们到外面找来一个年纪大些的护理员，要他给克默里希打一针吗啡。

他拒绝了。“要是我们把吗啡开给每一个人，那我们得有满满的一桶才行……”

“你们只肯好好地侍候军官。”克罗普恶狠狠地说。

我急忙去打圆场，递给那个护理员一根纸烟。他接过去了。我便问道：“那也允许给普通士兵打一针吗？”

他很气恼。“你都知道这不行，何必还要问我呢？”

我又把几根纸烟塞到他手里。“请你给我们帮个忙吧——”

“好吧。”他说。克罗普跟着他一起进去，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人，想要自己去看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缪勒又把话题转到长筒皮靴上来了。“那双靴子，给我穿起来可合适得真是没有话说咧。穿着自己这双笨重的皮鞋，我总是起泡，一个接一个。你认为他会拖到明天早晨值勤以后吗？要是他夜里就去了，那我们眼看着那双长筒靴——”

克罗普回来了。“你们觉得——？”他问。

“没救了。”缪勒惋惜地说道。

我们朝营房走回去。我想起明天一定要给克默里希的母亲写的那封

信。我全身都凉了，巴不得喝一杯朗姆酒。缪勒拔起几根草，塞在嘴里嚼着。蓦然间，矮小的克罗普把纸烟往地上一扔，用脚狂暴地乱踩，抬起一张毁损了的、心神不宁的脸向四周看着，结结巴巴地说道：“臭狗屎，真他妈的臭狗屎！”

走了好长一会儿，克罗普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前线士兵精神失常的表现，在这里，每个人有时候都会这样。缪勒问他：“坎托列克写给你的信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笑了：“他说我们是钢铁青年。”

我们三个人都气恼地笑了起来。克罗普在咒骂：他心里很高兴，因为他还能够开口说话。

是的，他们的思维就是如此，这成千上万个坎托列克！钢铁青年。青年！我们没有一个人超过二十岁。但还年轻吗？青年？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现在都老啦。

2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1]》，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

[1] Saul，根据《圣经·旧约》，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国王。——译注，下同